

## 《万国公报》最早向国人提及马克思

《万国公报》原名《教会新报》，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刊，早期为周刊，起初为宗教性质刊物，但也开始引用欧美报纸消息，并使用赛会和赛党等词语指代社会主义，还简单介绍过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消息。《教会新报》出至301期时改名为《万国公报》，性质上由侧重传教演变为侧重刊登政治时事内容。1883年因经济原因停刊。1887年英、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、商人等在中国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成立，1889年2月《万国公报》复刊，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，同时改为月刊。

1899年2月到4月，《万国公报》在第121到124册中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共同翻译完成的《大同学》，文章中李提摩大节译、蔡尔康撰写了一段从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节选的语言，其文字是这样叙述的：“纠股办事之人，其权笼罩五洲，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。”这段文字现在的译文是：“资产阶级，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文章中提到“马克思”的名字，其中写道：“以百工领袖著名者，英人马克思也。”显然，在这里把马克思说成是英国人是错误的。这可能是由于马克思长期生活在英国，文章作者对马克思并不很了解而造成的。但这毕竟是近代以来，中国刊物上第一次出现“马克思”的名字（1899年4月《大同学》第123卷第3章中，又有“德国之马克思”的叙述）。在同年出版的《大同学》中，恩格斯的名字也被提及。书中写道：“德国讲求养民学者，有名人焉，一曰马克思，二曰恩格斯（即恩格斯一引者注）。”这是中国首次介绍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也是中国媒体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和主张。后来，广学会把《大同学》汇总出版，销量达到了2000册之多。

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## 西奥多·罗斯福与画家的“战争”

为历任总统画像是美国的一项传统，但不是所有总统都喜欢自己的肖像。

为杰出人物画像的传统起源于欧洲。自从1789年乔治·华盛顿入主白宫，总统成了最受美国人关注的公众人物。由此，在摄影还没出现的年代，为总统画像成了势在必行的政治任务。

按照白宫历史协会的说法，20世纪前，为总统画像的开支基本由国会承担。此后，这笔钱越来越多地来自私人捐赠。老布什总统上任后，国家肖像馆接过了为画像筹款的任务，并负责推荐画家，由总统“钦点”。每位画家的酬劳并不相同。

众多美国总统中，对画像最不满意的可能要数西奥多·罗斯福。1901年，老罗斯福上任没多久，法国使馆就打算送他一份见面礼。恰巧法国画家西奥博尔德·查特兰在罗斯福府上做客，

法国驻美使馆便委托他为罗斯福作画。

无论从哪个角度思考，这幅画看上去都会是成功之作。查特兰绝非无名之辈，他画过的人不计其数。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曾这样评价他为自己创作的肖像：“这幅画将让我流芳百世。”然而，画布揭开那一刻，罗斯福大失所望，“我看起来像只哀嚎的猫”。不但他不喜欢，孩子们也经常拿这幅画跟他开玩笑。

事后，查特兰向法国《费加罗报》抱怨，要让罗斯福安静地待着简直太难了。他“充满个人魅力，还会用法语说俏皮话”，但“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不老实的‘模特’”。

6年后，老罗斯福终于忍无可忍，下令把“哀嚎的猫”丢进火堆，重新找人给自己画像。这回，前来执笔的是画家约翰·萨金特。

两人的合作仍不顺利。萨金

特坚持按自己的想法行事，而罗斯福有不喜欢别人发号施令的“暴脾气”。某日，双方的冲突全面爆发，罗斯福指责萨金特“不懂我想要什么”，后者则回敬，“是你不会摆姿势”。罗斯福听过怒不可遏，转身吼道：“我不会？”

那一瞬间，总统怒发冲冠的模样让画家灵光闪现，他很快勾画出了后人熟知的老罗斯福：腰板挺得笔直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扶在楼梯上，眉宇间充满威严。“他画出了总统的灵魂……他的能量、他的警觉、他的侵略性、他的不服输，却隐藏了他受人尊重的仁慈和慷慨。”对这个版本，罗斯福总算满意了。

“照片是直白的、一览无余的，绘画则是谨慎的、深思熟虑的，它反映了画家对总统的解读。”历史学家凯特·勒梅说。

据《青年参考》

## 清朝灭亡后格格们的生活

清朝大多把公主嫁给蒙古部落的王爷们。然后清朝的皇族也大量娶蒙古部落的妹子，是谓满蒙一家。电视剧中的格格你情我浓的，其实现实中皇家规矩很多。

清朝灭亡之后，格格的管理就没有这么严啦，比如溥仪的妹妹们，有的就嫁了平民。

比如人称末代皇姑的七公主爱新觉罗·韞欢，她是溥仪最小的妹妹。后面改姓金叫金志坚。父亲醇亲王载沣也是摄政王。清朝没了之后，她们家的情况也比较好，不像其它王府很快就家败光了。有的王爷后面上山摸金，上街要饭。很多铁帽子王的王府也早在民国初就卖掉了。而醇亲王充满智慧的在新中国之后才卖房子。当时卖给了高级工业学校。醇亲王的后人也多从事教育工作。

韞欢从事的是教育工作，一开始在学校当园丁，后来成为老师，在小学、初中都教过书，还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。她嫁的老公乔宏志也是一名人民教师，而且还是自由恋爱。算是格格中第一代自由恋爱的人。

可以说，在历史巨变的时期，她们也在努力调整自己，去适应新的时代。这大概也应了那句诗：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据《各界导报》

## 何谓“铁帽子王”

所谓“铁帽子王”，是指世袭罔替的王爵，它源于清代的封爵制度。铁帽子王和其他亲王相比，享有的特权一是“世袭罔替”，隔代不降爵；二是俸禄优厚，岁俸银1万两，禄米1万斛；三是赐予世袭罔替王府，又叫铁帽子王府。清代，共有12位承袭爵位无需降等的“铁帽子王”，其中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：即礼亲王代善、郑亲王济尔哈朗、睿亲王多尔衮、豫亲王多铎、肃亲王豪格、庄亲王硕塞、克勤郡王岳托、顺承郡王勒克德浑，因为他们功勋卓绝，所以获得世袭罔替的永久封爵，同时还享有配享太庙的殊荣。

另外四位属于恩封，他们是清代中后期在稳固江山中立功而受封的，即怡亲王允祥、恭亲王奕訢、醇亲王奕譞、庆亲王奕劻。

清王朝分封皇室爵位共有功封、恩封、袭封和考封四种形式十二等爵，其中辅国将军以上还分世袭罔替和世袭递降两类。一般情况下，因为功封王爵者多



恭亲王奕訢

属世袭罔替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“铁帽子王”。因为恩封爵位者则多属世袭递降，但在递降到辅国将军这一爵位时便不再递降。获得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等爵位的宗室并不能世袭，每世递降一等。无爵位的宗室叫“闲散宗室”，用四品顶戴。惟有12大“铁帽子王”因为其祖先功勋卓著，被赐世袭不降封典。如果某“铁帽子王”获罪夺爵，以其旁支袭爵，但其后世也不乏被夺爵的历史记载。

据《中国经营报》

## 年号的由来

汉武帝以前，无年号之名目。史书以帝王的年次纪年，记时则与帝王之号合称。如周宣王元年、二年、三年，一直延至帝王之位更迭为止。嗣王即位或改朝换代新王、新帝登基，则改用嗣王或新帝年次纪年，称元年、二年、三年等。这种“帝号纪年”或“王位纪年”之法一直沿用至汉代，帝王在位期间从无“改元”现象。

关于最早出现的年号，大致有二说。一是据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，十九年十月，武帝率众狩猎，获稀有独脚兽白麟一只，众臣一致认为这是吉祥之物，值得纪念，便向武帝建议用来纪年，于是便立年号为“元狩”，称此年（公元前122年）为元狩元年。“狩”乃打猎之意。以后则有元狩二年、三年……清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，认为汉武帝此举乃立年号之始。此后，武帝将即位元年至元狩之间的十八年追补了建元、元光、元朔等三个年号，每隔六年更换一个。而到元狩六年

时，汉武帝获三足宝鼎一尊，众臣认为是吉祥宝物，建议用来纪年，于是武帝便改年号为“元鼎”。“建元”就是“建为元年”之意，表示年号纪元开始使用。于是就有了第二说，即颜师古认为的“自古帝王，未有年号，始起于此”。后代的史学家大都将建元元年作为年号纪年之始。其后，每遇军国大事、重大祥瑞、灾异，帝王常常改变年号。而新皇登基，更须确定新年号，以示君威。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二年算起，其间亦有从当年某月即算起之情况。

据《各界导报》

## 何易于：二十四史中唯一有传记的县官

唐文宗太和年间，益昌县（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）的县令何易于，是一个勇于为民请命，勤于为民办事的好官。有一次上司乘船春游来到益昌县，让县里征发民夫拉纤。为不耽误春忙，何易于带着县里的衙役来到江边，亲自抄起纤绳拉了起来。上司见到，羞愧而去。

益昌县有很多百姓在山种茶，补贴家用。但朝廷要重征茶税，下发诏令要求地方官吏如实申报征课，不得隐瞒偷漏。何易于看了诏令说：“益昌人不征茶税，且不可活，何况征税？我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使一县的百姓都受苦难！”他不顾违抗朝命的罪名，亲自点火把诏书烧了。

州里的观察使知道了这事，感于何易于挺身为民，没有弹劾他。

何易于经常向老人们请教自己施政的得失。他治理益昌三年，牢狱里没有一个罪犯……

这样一个清廉、勤政的好官，官运却很不亨通。在益昌三年任满，朝廷对他的考绩为“中上”，即中等偏上，被平调到罗江县当县令。

何易于虽然没有升官，但百姓感激他，《全唐诗》收录的《建昌民歌》这样唱道：“我有父，何易于。昔无储，今有余。”欧阳修编撰的《新唐书》给他写了传，据说这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县令的传记。

据《新商报》

## 朱文熊：中国最早力推普通话的人

1906年，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《江苏新字母》一书中，把汉语分为“国文”（文言文）“普通话”和“俗语”（方言）。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，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：“各省通行之话。”

朱文熊在清光绪三十（1904）年，经江苏巡抚端方亲自选考，得以出洋留学，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主修物理和数学，与鲁迅、许寿裳成为同窗好友。

宣统二（1910）年，朱文熊学成回国。1913年7月受聘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。1914年担任民国教育部（教材）编审员，与鲁迅等人组成“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”，一度任京师图书馆馆长。1919年被聘为“国语统一筹备会”会员，同期的会员有蔡元培、胡适之和林语堂等。

在第一次“国语统一筹备会”会议上，朱文熊就明确指出：“我



朱文熊

国言（音）与文相离，故教育不能普及，而国不能强盛，泰西各国，言文相合，故其文化之发达也易。”他力推“普通话”的目的，是为了做到“言文相合”，普及教育，促进文化发达，以强盛国家。这与“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中国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

在这之前的1906年，朱文熊已经自创了一种“言文一致”的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汉语拼音方案，以推进中国文字的改革。他写了

一本书《江苏新字母》，书中把汉语分成三类：国文（文言文）、普通话和俗语（方言）。他不仅提出普通话的名称，而且明确给普通话下了定义：“各省通行之话”。还主张采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，不必生造。且只用26个拉丁字母和5个倒放的字母、一个横放的字母，而不用其他自创的字母。朱文熊先生所提出的“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，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”的观点，成为后来拉丁化拼音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。

然而，由于当时国运多蹇，朱文熊竭精殚虑所提出的“汉语拼音”和“推广普通话”方案，始终未能得到当局的重视和推广。他只能在无锡、上海、苏州等地以教席谋生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“普通话推广运动”才有了迅速的发展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